

当代中国人生存失范的峻切书写 ——新文化观与文学生存论观照下的《活着之上》

王攸欣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阎真《活着之上》因为对中国大学与社会生存失范状态的峻切书写, 成为2015年当代文学界热门话题。从基因同异创化论与文学生存论视角, 对《活着之上》所写的主题与人物作出分析, 指出中国人近代以来面临新的历史境遇与资源竞争对象, 竞争激化, 造成了生存失范的文化历史境况。聂致远、蒙天舒等不仅是中国大学教师生存困境的体现者, 更是整个中国当代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对于他们的叙述、虚构凸显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生存真实。

关键词: 《活着之上》; 生存失范; 基因同异创化论; 文学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4-0151-05

一、引言

阎真《活着之上》成为2015年当代文学界与新生代读者群的热门话题之一, 是因为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包括大学校园浮躁、失范生存状态的症结。《活着之上》初以删节本刊于《收获》2014年第6期, 2014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本, 据作者提供给我的最新印本, 已是第7次印刷, 印数累计多达16万册, 足见读者之广。检索中国知网文献, 仅在2015年, 以《活着之上》为主题的报刊文章, 已达68篇^①, 可见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度之高。除了“路遥文学奖”评委之一旷新年教授有甚为尖锐的批评, 另有个别学者持保留态度以外, 其他评论者大都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活着之上》, 认为作品真实深刻地写出了当今中国大学的不良生态和高校教师的生存困境以及在此困境中的纠结与挣扎。^②第一届“路遥文学奖”也宣示了当代文学评论界对于这部新作的认可。

笔者与作者阎真相识已20多年, 硕士研究生系同出先师颜雄先生之门, 很长时间又同处一个小单位, 自以为对作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活着之上》所写的不少生活细节, 就是我们共同见证或耳闻, 还有些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所遭遇或作为的。对于其中某些具体情节所显示的意义和评价, 笔者和作者并不一致, 但

从阎真对细节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来说, 显示了他那细腻体贴的感受力, 富于才华的想象力和立足于利益立场的精明思虑——这一点在我看来既是阎真理解世界、书写人性的支点, 又是他的小说获得多数读者认可的很重要的原因。他笔下人物性格的合理性, 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此, 而且这也确实可以说是芸芸众生难以摆脱的生存基点。他所着力书写的利益, 主要是比较直接的物质利益、职位利益, 以及由此引起的人物心态失衡、行为失范问题, 实质上也显示了更根本的利益得失以及人性尊严、人格价值失落的问题。《活着之上》是一部小说, 所以作者大可以把这些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虚构的素材进行书写^③, 不一定会引起当事者的对质和非议, 但本文作为论文, 不可能通过指出这些生活细节的来源和笔者的理解来分析这部作品, 因为这会涉及到具体的人事; 何况写入小说的事件与生活故事本身, 毕竟具有很不相同的语境, 不宜再去刻舟求剑, 加以比较; 再说, 对于那些事例的举证论述, 总有可能伤害真实的当事人, 所以我在论述之前想提醒读者, 我对文本的分析是隐恶避讳的。

二、新文化观观照下的焦虑、失范根源及其书写

阎真对于时代剧变中的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人生存状态演化是相当敏感、深有感触的。这一特点早在

他 1990 年代初从加拿大的圣约翰斯大学里修了几年社会学课程后回国时就很突出,也在他创作的全部四部长篇小说中都有充分展示。^④《活着之上》尤其以其叙述的内容与书写的方式显示了时代的整体状态,那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普遍存在的焦虑心态和行为失范,人性尊严缺失——中西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在各种各样的权力和利益争竞中,越来越失去其约束力,多数既得利益者和相当多的竞争失利者,信奉着小说所写的“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一看上去坚定不移的“俗谛”。作者以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众多小故事和小说主人公“我”——聂致远的痛苦、纠结、妥协和次要人物蒙天舒的多方面“搞到了”来充实着这一“俗谛”的具体内涵。应该说,在叙事的细腻、灵活,俗语运用的绘声绘色、简明扼要以及故事的观赏性上,作者的才能是相当出色的,人物个性在这种叙述中生动起来,甚至把一般人隐约地潜藏在心底未见得敢公然表达的欲望,陡然凸显出来,似乎每个人都面临着难以摆脱的生存资源匮乏的焦虑,时时刻刻无法自拔,让多数读者感到这几乎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必须直面的真实。这是作者叙事的成功。当然,作为小说,表现了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却不太可能去探讨这种状态的文化与历史根源。笔者试图以自己提出的基因同异创化论文化观,来审视这种生存状态,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历史演变过程对其根源作出简略分析。

基因同异创化论的新文化观要义在于:人是基因的承载者,文化是特定的具有共同基因库的群体以基因延续的资源分配为中心创化出来的。人作为基因主体,具有不同的层级,包括个体、家庭、家族、亲族、民族、种族、人类等等,各个层级的基因主体的基因共同性程度不同,因此导致不同主体基因延续、扩展机会利益的共同性程度不同,在不同层级基因主体的竞争与协调中,就必然创化出包容不同价值取向、社会体制、竞争协作方式等的文化整体。^⑤作为特定的基因群体,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竞争的对象、范围和条件,总是会发生变化,这样必然需要不断地调整由长期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规则,包括利益竞争规则。但急剧变化的社会状态可能使政治生态、伦理生态以及价值体系、竞争规则发生崩溃,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难以建立合理而稳定的新的伦理规范和竞争规则,对权力、金钱等的贪欲,似乎真成了历史的所谓“恶的动力”,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生存失范,让多数人对自身的生存利益包括基因延续的机会利益没有信心,焦虑不安,其中一部分人进一步不择手段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形成恶性循环。

19 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此前的中国,尽管朝代更迭,治乱相寻,普通百姓的生活大多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不同个体、群体的利益、资源竞争还大体局限于中华民族内部,甚至限于小范围之内。普通民众观念封闭、信息阻塞,中国文化几千年所创化成型的少私寡欲、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等价值规则深入人心,纲常伦理又具有强大的行为约束力,社会阶层流动渠道没有完全封闭,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和分配体制长期相对稳定。但晚清时期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异民族裹挟着社会体制、军事、工业、商业的巨大优势,涌入中国,不仅掠夺了大量的生存资源,同时更生产或输入了甚为丰富的物质产品,但这种资源和产品的分配方式,同西方文化一道,直接对中国原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造成极大冲击,与政治混乱相互作用,促成王纲解纽,规范沦丧,而且使得中华民族生存的竞争已经不止停留于内部,因此种族、民族、国家、个人的生存危机感几乎与时俱增,相当多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失去了民族自信,形成了焦虑而缺乏安全感的心态。在政治上,随着清朝政权的崩溃,形成了权势者挟持武力争夺利益的民国政治的基本态势,尽管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略有不同。在这个时期,代表国民最高智慧水平的独立知识分子,还能对政治有相当的影响力,但阻挡不了社会状态恶化的基本趋势。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掠夺和人格摧残,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一起,使得中国人民走投无路,以致必须翻天覆地而后止。通过武装斗争掌握政权的领袖人物,代表着人民中的下层劳动民众,主观上或许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追求,但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国内存在各种矛盾冲突,在国际政治格局经常处于被孤立、威胁状态,时刻具有危机意识,一直存在着的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斗争与权力争斗,让社会长期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体现着民族智力水准和人格尊严的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独立学者的能力与才华没有得到适当的运用和发挥,使国家、社会发展相当滞缓,治理水平不高,相当长时间出现基本生活资源的严重匮乏,人们的欲望与尊严长期被压抑到较为低下的水平,整个民族的生活状态处于相当贫困状态。专政体制的权力运作的有效性,还是让社会秩序出现了十多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因为社会治理水平的不足,人民的生存需求满足也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国家大政反而不得不几经变换,稳定性不强,也在更深的层面上,瓦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伦理规范,新文化运动输入的西方文化价值准则,从未充分实现,

且早已名存实亡，又极大地强化了权力对于人性尊严的轻忽甚至肆虐。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本来就甚为缺失的人性尊严更趋卑微，同时也摧毁了高校中还没有很好地构建起来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文精神传统，政治评价代替、压抑了学术评价。文革以后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触目惊心，以改革开放打开封闭已久的国门，在不算太长的30多年里，借助现代技术全球化之势，物质资源的丰富已经堪称“盛世”——其过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证实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转述黑格尔关于贪欲与权势欲所代表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论断——但因为价值、伦理失范和权力、金钱对人性尊严的暴虐，同时也因为信息传播的发达，影视产品和商业广告对于人类欲望尤其是性本能的无节制的刺激和利用，对于优势生存资源的竞争，在全球范围的比较中，扩展到越来越广的领域，提升到越来越高的标准，愈来愈激发起人们不可能满足的欲望，自然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竞争进入近乎疯狂的状态。而现实的资源竞争、分配规则与潜规则的不合理性，又为这种不当追求产生的极端行为提供了某种似乎合理的借口。这种竞争状态延伸到大校园里，大学普遍存在不以真实专业水准而是以量化指标作为衡量教师价值的人事制度运作状态，人文精神几乎消解殆尽，即使没有多少专业修为的教师，也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他们总以为相对于不学无术、通过各种手段爬上去的行政官员们，多少总有些专业知识，因此而愤愤不平，由此进一步降低学术追求的意愿，也自然降低了学术的水准。《活着之上》正是以作者特定的眼光，特定的生存欲求，凸显了这样一种时代的焦虑、疯狂状态，人性尊严丧失的状态。如果不是作者本人具有这样深切的欲求与焦虑，这种状态是写不出来的。这是作者代表着时代，写出这部能够被多数读者认可的小说的真正根源。作者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是在欲望的激荡中又带着冷酷的理性，把握住了这个时代普通人生存境况的根本特征，因此在我看来可以作为时代的代表作之一，为这个剧变的阶段留下历史的刻痕。文本对人性本身的反思还缺乏适当的超越感，尽管标题为“活着之上”，也试图写出某些带有超越性的段落，但不如说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就在对于主人公压抑、纠结地“活着”的叙述。作者如能够像他的老同学于慈江所论，“想有所突破，就必须从密实走向疏离：要有足够大的空白，要有闲来之笔，要有偶然因素，要有一些耐读者咀嚼的神秘莫测感”^⑥，也就是在叙述中加入一些真正跳跃出焦虑急切

生活的段落，写得不那么峻急，有可能给小说增加超越的魅力。当然，这需要作者本人自觉积累更为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对于文化的超功利价值取向的体悟，因为文本的创作即作者的文学生存过程本身的呈现。

三、文学生存论观照下的人物书写

笔者在2002年第八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上正式提出文学生存论，后在不同公开场合宣讲或发表论文。^⑦文学生存论要旨如下：文学总是一定程度上对作为文本叙述对象的人物之生存状态进行相对真实的书写，更是创作过程中的作家本人生存状态之绝对真实的呈现——甚至包括作家有意识地掩饰自身和扭曲叙述对象生存实况的这样一种真实状态——在文本的阅读中，又是读者在自身的缘构发生中的生存境况与境界的体现，文学研究者应该着力从文本的缝隙和破绽中开掘作者的生存真实，由此来显示自己的生存深度与内涵，当然包括价值取向。^⑧这种观念不仅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准则，也可以扩展到一切文本研究。

小说文体作为文学生存分析的关键标本之一，对大多数文本来讲，当然是在叙事中所虚构的人物形象。《活着之上》着墨最多的人物形象是“我”——聂致远，其次是蒙天舒与赵平平，这里因篇幅所限，也主要就他们作出分析。

聂致远在作者的叙述中有着一定的学术志向，读大学时选择了功利性不强的历史专业，毕业时保送了研究生，说明他很努力，也有一定才能。从他的两次导师分配、调换来看，他相对于蒙天舒来说，最初是相当朴实的。他选择了历史专业的思想史方向，文本写到他的学位论文撰写和职称晋升都没有投机取巧，作者似乎有意写成与蒙天舒对照的正面形象。但文本同时通过人物对话，显示聂致远并不是那种“谁也压不住”的才能非常突出的人物，而且从聂致远的人生思考和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中，也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史专业的博士和大学教师，他实际上是并不太合格的——这里很可能是因为作者本人并非思想史以至历史专业出身而造成了较大的叙事破绽，因此使其笔下人物与本来的创作意向产生了较大距离。如聂致远列举中国历代反功利的代表性人物时，遗漏了中国先秦时代超功利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对此后中国文化中形成超功利最高价值准则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庄子。当然还有其他遗漏。而他列举“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并说“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

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是很可疑的。“反功利”是一个非专业化的用语，把“反功利”的概念笼统地用在这些人身上也并不太准确、恰当。功利这个词既指个人的利益，也可指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大多能有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却并不一定是反功利的。孔子作为先秦原始儒家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思想史上恰恰被看作是中国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创立者之一。他所创始的儒家文化，虽然也有着超越性追求，如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但西汉以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维护皇权统治，讲究亲亲疏疏、推己及人，这些都不能说是反功利的。孔子本人更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列国，谋求执政，但无一成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他的伦理观念与政治理想的重要内涵，是仁与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正名等等，这些都不宜用“反功利”来描述。文本中聂致远作为人生榜样反复谈到、几乎贯穿全书的曹雪芹，更不能用“反功利”去描述。尽管《红楼梦》的写作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根源，恰恰在于个人的得失与家族的衰败，是由这种个人、家族悲剧带来的深刻人生体验和感悟。即使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主人公贾宝玉贬斥通过科举爬上仕途的官员为“禄蠹”，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私利”——拥有众多女儿们的感情，让她们陪伴到死。宝玉最后出家也谈不上真正的超越，而是伤心欲绝之后抛妻弃子的无可奈何的逃避^⑨——在曹雪芹本人的实际生活中也并非这样的结局。在《活着之上》以容易引导读者同情主人公的一人称叙述中，聂致远这样一个专业水准并不高的大学教师形象，很自然地成了被同情的对象，较为顺利地评上了教授，而读者们大多对他颇为赞许，因为相对于蒙天舒，他还算有廉耻，还算努力，还算有一点真才实学。文本真正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写出了中国大学的残忍真实：即使是没有多少专业成就的教师，因各种非专业原因评上了教授职称，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对现实还是极为不满，而且有其不满的充分理由——在大学里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可能有一些比他更加不如的投机取巧者，由他们确定着各种游戏规则，甚至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些规则。从这个超出作者设想的意义上来说，《活着之上》有其非常成功之处，那就是显示中国大学的生存实况，而且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既成利益分配格局和学术评估现状。

作为主要人物聂致远的对照者或陪衬者，蒙天舒是带有时尚风格的人性之恶与国民性之陋的卑俗表演

者。他的投机钻营与不择手段几乎成了他通行于今日中国社会的法宝，他的性格还不能说有实质的多面性，谈不上丰满，但作者选择来为他塑形的丰富细节可以说在社会现实中比比皆是，具有让人无法躲避的冷峻真实性。个别情节曾有人指出不太合乎情理，那在我看来大约只是行文的疏失，作者完全有能力理解他的行为逻辑，事实上文本已经清楚地表达。在小说开头部分，蒙天舒一出场就直白地表露了的，那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论，这也贯穿了整个小说，以各种方式具体化，他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结为这一原则的践行，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度的“理性主义”者和“知行合一”者。当然，作者的叙事语调是讽刺的，审视态度是批判的，让读者感觉到他在代表着社会正义，不过，似乎在讽刺批判中也带有些许的羡慕嫉妒恨——真正显示出文本叙事的生存阈限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作者尚没有以充分的人性尊严感和对人格价值的体认，悲悯地理解这个人物的可怜和卑微处。这样一位钻营者，在被文本忽略的具有正常人格的普通高校教师，更不用说在那些作者所谓“才华横溢”却未被书写者的眼中，是相当可怜的，不会因为他一时得势与得利，从心底冒出敬意与钦羡，即使他自己也未必没有自惭自疚的心虚，良知闪现时的自卑，文化所创化出来的价值准则，仍然在相当多的文化人内心深处持存着，这才是中国社会与大学或许现在看起来渺茫的希望所在。

赵平平在小说中作为与聂致远最贴近的人，在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中也显得格外逼真，这是一个让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孙柔嘉的人物。她骨子里的俗气和小气，出自于她生活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状态的熏染，看不到任何希望。作者用活生生的俗语写出了她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或许是不容易写出来的。因为在笔者所观察的中国女性中，这种类型似乎并不那么普遍。中国女性在与男性的比较中，似乎还没有那么对于物质利益的偏执，至少在文化女性中多数还没有那么入骨的俗。笔者认为小说写得很有深度的一点是，尽管生活中的女性有各种功利性选择，作者让赵平平在选择婚姻对象时还是确定了聂致远，而不是能够提供给她足够丰富生活资源的大老板，因为这关涉女性生存利益最为根本的基因资源与基因延续机会，凑巧印证了笔者提出的基因同异创化论。由此也说明作者在他的生存经验中，相当真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以自然的笔触写出了赵平平的精明之处，也是她还没有完全被社会现状扭曲的人性本真。

注释：

- ① 其中一篇《〈活着之上〉与第一届路遥文学奖——评委原始评语》(《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包括王向晖、方岩、王素霞、萧夏林、邵燕君、赵勇、黄发有、旷新年、陈汉萍等九位路遥文学奖一审、二审评委各自的原始评语共9则。
- ② 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有：于慈江《“活着至上”与“活着之上”的拉锯、纠缠与挣扎》(《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欧阳有权《超越“活着”与活法的重量》(《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聂茂《从人生的悲苦中寻找超越》(《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3期)等文；黄力之《“模范社会”忧思录》(《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0期)；陈晓明《为时代写真，为文人立命》(《湖南文学》2015年第4期)；雷达《物化时代的精神拷问及其它》(《湖南文学》2015年第4期)等文；胡良桂《大学精神的坚守与颓落》(《湖南文学》2015年第6期)；赵勇《知识分子的底线意识，或聂致远的书生气》(《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等文。
- ③ 据作者自称，小说中具体故事细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真实发生的事，他只是在不同形象之间作了拼接。
- ④ 阎真先后出版《曾在天涯》(1996)、《沧浪之水》(2001)、《因为女人》(2007)、《活着之上》(2014)。
- ⑤ 请参看王攸欣《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红楼梦〉根要》(《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4期)、《再论新文化观及〈红楼梦〉

根要》(《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期)，两文集中提出了基因同异创化论的新文化观。

- ⑥ 请参看于慈江《“活着至上”与“活着之上”的拉锯、纠缠与挣扎》，文章提供了对于作者写作的具体建议，态度是真诚的。该文刊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 ⑦ 如2005年在湖南卫视与岳麓书院联合举办的“千年论坛”上，笔者与主讲嘉宾乐黛云先生的对话，就文学生存论作了阐述。后在《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文学生存论》，接着又发表一系列论文，在作家研究中作了具体应用，如《穆旦晚年处境与荒原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潜隐与超越》(《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与龙永干合作)、《论朱光潜的学术品格》(《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价值体验》(《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卞之琳诗作的文化—诗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庄子与时俱化的生存智慧》(《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等，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 ⑧ 请参看王攸欣《文学生存论》，《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后来笔者就文学生存论的具体应用文学研究作了一些尝试，也理论表述上也对文中的某些观点作了调整。
- ⑨ 笔者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主要仍是曹雪芹原著，请参看王攸欣 贝京《〈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作说的方法论观照》，《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期，王攸欣《以诠释学眼光重审〈红楼梦〉高鹗续书说》，《湖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此处不细论。

Severe and conscientious writing of existential anomi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On Yan Zhen's *Beyond Living* in the light of Neo-cultural concept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Existence

WANG You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Yan Zhen's novel *Beyond Living* became a hot issue in 2015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ircle because of its severe and conscientious writing about existential anomi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Gene-identical-discrepant Evolutionism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Existence, the present essay analyzes the theme and characters of *Beyond Living*,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new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new objects in the resource competition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causes the existential anomie. Such characters as Nie Zhiyuan and Meng Tianshu are not only the embodiments of the college teachers' existential dilemma but also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whole modern China, the narration and invention of whom highlight the life reality of som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Beyond Living*; existential anomie; Gene-identical-discrepant Evolution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Existence

[编辑：胡兴华]